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何泽棠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州 510642)

摘要: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 在当代史的视野下, 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 在利用黄帝《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 对黄帝的编年加以考证, 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 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 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 点明了题旨, 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 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关键词: 史容; 黄庭坚诗; 诗歌注释; 编年; 以史证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2)04-0152-05

史容字仪甫, 南宋时人, 生卒年不详。号芗室居士, 眉州青神人, 仕至太中大夫, 著有《山谷外集诗注》。元人方回在《跋许万松诗》中又著录了史容的《后山诗外集注》一种, 现已不存^①。史容之前注释黄庭坚诗者, 有任渊《山谷内集诗注》, 注释对象为洪炎所编《山谷内集》之诗。史容作注的动机, 在于续补任渊之注, 注释对象为李彤所编《山谷外集》之诗。历代学者对《山谷外集诗注》评价较高。宋人钱文子《山谷外集诗注序》云: “其于山谷之诗, 既悉疏理, 无得凝结, 而古文旧事, 因公之注所发明者多矣!”^[1]《四库》馆臣则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诗注》的编年之功(见下文)。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中对史容注进行了修订。当代学者钟东著有“‘随注’而‘该通’——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略论”一文^②, 探讨了《山谷外集诗注》的版本、体例及价值。本文拟探讨《山谷外集诗注》在当代史的视野下, 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阐释黄庭坚诗的学术价值。

一、宋代诗注重视历史解释的学术背景

早在先秦时期, 孟子就提出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解释观, 以历史为背景来考察诗歌。受此影响, 《诗经》毛传、郑玄的《诗谱》、王逸的《楚辞章句》都不同程度地解释诗歌的历史背景。然而《孟子》一书长期不受重视, 汉代以后只作为一部普通的子部儒家类著作流传。同时, 汉代以后的诗歌注释, 也不注重“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直到宋代,

《孟子》的地位才得到空前提高, 北宋时被列入“十三经”, 南宋时又被朱熹列入“四书”之中。于是, 孟子“知人论世”观又重新受到诗歌注释者的重视。

另一方面, 宋代史学十分发达。陈寅恪先生指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2]。宋代史学在编撰前代和当代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典章制度、地志、类书、目录学等各类历史著作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并且创立了纪事本末体。除官修史书外, 私撰史书著作亦多。宋代史学的繁荣, 除了为诗歌注释者提供更多史料作为理解诗意的背景外, 还促使诗歌解释者应用史学方法来认识并研究诗歌,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诗歌注释采用编年笺注的方式, 并附以年谱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一个编年史修撰的全盛时期, 从官方记载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大事的实录到个人撰修的私史, 数量繁富, 成就突出。宋代编年史学的发展, 使年谱这一微观的个人编年史应运而生。现存最早的年谱, 就是一批诗人年谱, 包括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工部诗年谱》与南北宋之交赵子栎的《杜工部年谱》。清人章学诚也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提到: “文人之有年谱, 前此所无, 宋人为之, 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 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3]此外, 宋代诗歌注释者常常采用编年笺注这一全新的编撰体例, 并将年谱附于诗注之前, 将诗作与作者的生平事迹逐年对照, 这对于读者的知人论世, 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

收稿日期: 2010-10-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宋人注宋诗研究”(09YJC751030)

作者简介: 何泽棠(1975—), 男, 副教授, 古典文献学博士, E-mail: Hezetang@scau.edu.cn

①(元)方回:《桐江集》,卷4,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 322册,4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

(二)引史证诗

先秦以来,史注中便有一种“引史证史”的方法,《左传》传《春秋》、裴松之注《三国志》,皆引杂说故事以补史之不足,或纠史之谬误。由于宋诗好议论,在杜诗长于叙事、具有“史”的认识性之外,呈现出新的“诗史”特征。因而宋代诗歌注释者对诗歌涉及时事的部分,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诗人个人生活的微观历史,都引用各类史实以证之,或证其可信之度,或补其未尽之处。

宋人注宋诗中,运用当代史阐释宋诗,已蔚然成风。《山谷外集诗注》出现较晚,史容虽在史学方面无特殊建树,但亦能自觉地使用历史解释方法,其“以史证诗”之功,主要表现在编年考证与解释时事两方面。

二、《山谷外集诗注》的编年考证

(一)史容编年的由来

《山谷外集诗注》先后有14卷本和17卷本两个系统。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14卷本初刊于蜀,故称蜀本。史容在这个版本的引言中说:“诗有古、律,悉从旧次;旧多舛误,略加是正,余且从疑,以俟博识。”^[4]可知这个版本依照的是李彤《外集》的旧有次序,即按照古、律诗的分体来编排。

蜀本面世之后,史容又对诗注进行了修订。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史容之孙史季温将修订后的《山谷外集诗注》重刊于闽,共17卷,故称闽本。与14卷本相比,17卷本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采用编年体例。史季温在《闽宪刊山谷外集诗注跋》中叙述这一体例的变化云:“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5]

宋代诗歌注释常用的体例有3种,编年为上,分体、分类逊之。史容将分体改为编年,无疑是一个进步。此外,史容还仿照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后山诗注》,将黄庭坚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系于诗集的编年目录之中,有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

清代学者对史容的编年评价较高。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27云:“任、史两注其精要处,尤在考核出处时事,集其大纲,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因其岁月,知其遭际,得以推求诗旨,洵乎注因诗传、而诗亦因注以传也。”^[6]《四库》馆臣评价道:“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纲皆系于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断

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可轻也。”^[7]

(二)《山谷外集诗注》的编年考证之功

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后山诗注》将诗集目录、诗歌编年考证、诗人文谱三者合为一体,史容则在此基础上略加变化。《山谷外集诗注》的编年目录中附以黄庭坚年谱,但诗歌的编年考证则分散在诗注正文的各诗诗题之下,这些编年考证最见其功力。在史容之前,黄庭坚的裔孙黄榦撰有《山谷年谱》,将洪炎所编《山谷内集》、李彤所编《山谷外集》及黄榦本人所编《山谷别集》中的诗歌综合在一起予以编年。史容较尊重黄榦《山谷年谱》编年时的考证成果,常加以引用,但亦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包括:

1.补充黄榦《山谷年谱》所阙的编年依据。如《古意赠郑彦能八音歌》,史容得山谷真迹,自言元祐元年题,因而入该年。又如《食笋十韵》,苏轼有和诗,史容根据《东坡集》的和篇入元丰六年,因而入该年。

2.纠正黄榦《山谷年谱》的编年错误。

尽管黄榦是黄庭坚之裔孙,所获家族资料较多,距黄庭坚生活的年代也比史容近,但史容并不盲从于黄榦的结论,而能通过精深的考证,纠正黄榦编年的不少错误。试看数例:

《别蒋颖叔》,黄榦入元丰三年,《山谷年谱》卷11云:“颖叔名之奇,尝作江淮发运。当是经涂所作。”^{[8][9]}史容改入元丰七年,云:“蒋之奇字颖叔。新法行,为福建通判,迁淮东运副。母丧服除,为江西运副,改河北。入奏计上,神宗奖谕之,移陕西。官制行,移淮南转运使,擢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元丰六年五月奏计上,神宗劳问甚备,赐三品服。此据《实录》也。此诗云‘三品衣鱼人仰首’,当是六年以后作。山谷移监德平镇,过泗州僧伽塔作,作《发愿文》,时元丰七年三月也。别蒋颖叔当是此时。”^{[10][11]}元丰三年黄庭坚从东京出发任太和知县,元丰七年从太和改官监德州德平镇,两次都途经江淮,而蒋颖叔亦皆恰在江淮。黄榦只是揣测,并无实据。史容根据诗中“三品衣鱼”之语,对照蒋颖叔的仕宦经历,认定元丰七年蒋颖叔官三品,因而断定为此年作。史容注中诗、史相参,史可证诗,更具说服力。

《平原宴坐二首》,黄榦入元丰元年,《山谷年谱》卷7云:“按蜀中诗刻先生真迹,题作《平原郡斋》……平原属德州,德与齐接境,故附于此。”^{[12][13]}史容改入元丰七年,云:“平原郡,德州也。山谷元丰七年在太和移监德州德平镇。此诗题下注‘公择’二字,诗意殊不相涉。盖本注于旧集《谢送宣城笔》而后人误置于此,今去之。”^{[14][15]}此诗题下有元注“公择”二字,黄榦未加分别,为地名“平原”与黄庭坚之

舅氏李公择找联系。因元丰元年李常(公择)任齐州知州,齐州又与属德州的平原相临近,黄庭坚便认为二者的联系在于此,此诗或为山谷前往齐州探视李常(公择)、途经平原时作,于是将此诗定为元丰元年作。史容指出元注“公择”二字与本诗诗意毫无联系,此二字应在《谢送宣城笔》诗题之下,而被传抄或刊刻者误移于本诗题下,显示出了非凡的判断力。史容再根据黄庭坚的改监德州德平镇的经历将其改入元丰七年,结论可信。

《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图》,黄庭坚入元祐二年,未作说明。史容改入元符三年,云:“山谷元符三年五月复宣德郎,自戎沂江,省其姑于青神尉廨。十一月复还戎,过嘉州,兴至乐山王朴子厚题桃杏花,草书超逸,今藏于洪雅杨氏。戎今为叙州。”^{[1]1048}史容本为青神人,对黄庭坚这段由戎州往还青神的经历较为熟知,且又访知本诗黄庭坚手书真迹所在,其说可依。

三、《山谷外集诗注》所释时事

宋人注宋诗,由于注释者上距诗人生活的年代不远,因而易于获得大量的史料以证诗意图。汪辟疆先生曾评价说:“宋人如施元之注苏,任渊注黄、陈,李壁注荆公,胡穉注简斋,以宋人而注宋人诗,故注中于数典外皆能广征当时故事,俾后人读之,益见其用事之严,此其所以可贵也。”^{[9]1049}史容亦能比肩上述诸家,以注时事见长。《山谷外集诗注》成书于嘉定元年(1208),距黄庭坚逝世的崇宁四年(1105)已逾百年,与任渊的《内集注》相比有两个劣势:一是时代相隔较远;二是史容不具备任渊曾亲随黄庭坚学诗的优势。任渊注时事的特长,在于释黄庭坚生活中微观的日常生活及交游、唱酬等活动。南宋林希逸在《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中说道:“前辈云:任渊、史会注陈、黄二诗,多得于同时及门之友,故其间略无差舛。”^[10]吴晓蔓在《任渊〈山谷诗集注〉的创作背景与今典考证》一文^①中详细地论证了任渊在这方面的特长。但史容注亦有自身的长处:其一,一些产生于南宋的文献,无论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编年体史书,还是吴曾《能改斋漫录》、王明清《挥麈录》等笔记,或是黄庭坚《山谷年谱》等黄庭坚个人史料,都是任渊无法接触的。其二,对一些对黄庭坚有密切影响的重大时事,如元祐党祸等,史容还注重以此为背景解释黄庭坚诗意图。

(一)释作诗背景

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以来,说诗者皆能在

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解释诗意图。宋诗好议论,尤好议时事。因此,揭示作诗背景在解释宋诗之时尤为重要。史容释黄诗背景,有三点值得注意:

1. 与元祐党祸相关者

黄庭坚在新旧党争中属于旧党,从元祐末年开始深受党祸之害,两度迁谪,最终贬死宜州。党祸对黄庭坚一生的影响至为深远,史容对此予以重点说明。如《寄忠玉提刑》题下史容注:

按黄庭坚《年谱》载其族伯父仲贲《跋承天塔记》云:先生初自蜀出峡,留荆洲待辞免乞郡之命,与府帅马诚忠玉相从欢甚。闽人陈举自台察出为运判,先生未尝与之交也。承天寺僧智珠造七级浮图,乞记于先生。一日记成,忠玉饭诸部使者,于浮图下环视先生书碑,先生碑尾但云“作记者朝奉郎、新知舒州事、豫章黄庭坚,立石者承议郎、知府事、荐平马诚”而已。举与运判李植、提举常平林虞相顾,遽请于前曰:“某等愿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举憾之,知先生昔在河北与赵挺之有怨,挺之执政,遂以墨本走介献于朝廷,谓幸灾谤国。先生遂除名,羁置宜州。忠玉亦以辰州徭贼寇边,监察御史席震继而劾之,夺官羁置海州,遂俱歿于贬所。不踰年,挺之去位,而举因指青虫为龙物,奏为祥瑞,遂坐欺罔。因备录,以见忠玉交于山谷坐累,而出小人陷君子之深。^{[1]1041}

史容引用了《山谷年谱》中的史料,除了介绍马诚忠玉与黄庭坚的交情,揭示本诗寄赠的具体背景之外,还将黄庭坚在马诚忠玉处得罪陈举而被祸,继而马诚忠玉也受牵累的经历详细交待清楚,又突出了黄庭坚刚直不阿的性格。此事可为黄庭坚在元祐党祸中的缩影,折射其后半生的命运。史容解题之功不可没。

相较而言,任渊注《内集》,对元祐党祸不甚重视。《内集》有大量作品是黄庭坚迁谪黔、戎、宜州时作,任注中却无一首结合党祸以解题。

2. 黄庭坚的个人生活及交游

除了元祐党祸等重大事件外,史容对黄庭坚的一些微观生活史也未忽视。如《书石牛溪旁大石上》题下史容注:

《同安志》云:石牛洞在三祖山山谷寺之西北,其石状若伏牛,因以为名。初,李伯时画鲁直坐石牛上,因此号“山谷道人”。题诗石上,所谓“青牛驾我山谷路”也。^{[1]742}

《山谷内集诗注》有《题山谷石牛洞》,任渊注:

^① 见《襄樊学院学报》2009(9):51-56.

石牛洞在舒州三祖山。皇祐中王荆公通守舒州，尝题诗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故山谷亦拟作。^{[1]16}

“山谷道人”是黄庭坚一生重要的标志，史容在与石牛洞有关的诗中引方志说明此称呼的来由，十分必要。相比之下，任渊注忽视了这一点。

又如《赠陈师道》题下史容注：

元祐元年二年二月，陈无已在京师，寓居陈州门。按《实录》，二年四月乙巳，徐州布衣陈师道充徐州州学教授。赠此诗时未得官也。按黄庭《年谱》，王景文质闻之荣茂世云：得之前辈言，山谷与后山相遇于颍昌，因及杜诗“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故此诗有云：“霜月入户寒皎皎，万人丛中一人晓。”^{[1]986}

此注交待了黄庭坚与陈师道相见并赠诗的背景，并说明了部分诗句的由来。

陈师道在《山谷内集诗注》中两见于诗题，任渊皆不注，只在《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第8首“吾友陈师道”句下注云：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徐州人，文行甚高。来京师，枢密章惇欲一见之而不可。^{[1]94}与史容注相比，对陈师道这样一位与黄庭坚关系密切的诗人，任渊注显然过于简略。

3. 考证传闻

除了解释作诗背景之外，史容还对一些笔记、诗话中的传闻进行了考证。如《太平州作二首》题下史容注：

崇宁元年春，自荆南归洪州分宁，因往袁州萍乡省其兄元明，还至江州，与其家相会。六月赴太平州，九日而罢。……又按张于湖孝祥作《高侍郎三大夫墓志》，侍郎讳卫，为太平州判官，山谷来为守，谪久贫甚，既入境矣，复坐党事免。侍郎得堂帖，不以告，迎候如礼。山谷既视印已，乃知之，侍郎为治归装甚饬备。观此，则《冷斋夜话》载徐师川言东坡欲学长生，莹中对日者谈命，山谷赴官姑熟，闻罢而俯就，其说妄矣。^{[1]1056}

此注史容引用各类材料，说明了黄庭坚任太平州的前因后果，交待了本诗的背景，并纠正了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的错误。

《冷斋夜话》卷10“三君子瑕疵可笑”条云：

徐师川曰：……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视事，闻当罢，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问其故，曰：“不尔，无舟吏可迁。”夫士之

进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也，岂以舟吏为累耶？^[1]

对照史容注，不难发现，惠洪所引徐师川的言论属道听途说，可信度不高。

(二)解释与时事相关的句意

宋诗好议论，作为宋诗代表人物的苏轼与黄庭坚的议论又有所不同。苏轼议论时事，比较直接，黄庭坚对此甚至有“好骂”之评。而黄诗之议论，则以下笔曲折、命意深远而著称。熙宁变法之争、元祐党祸之烈在黄诗中常常得到反映，却用各类典故与比兴手法委婉道出，一般读者难窥其用意所在。史容能结合时事反复推敲，最终钩出山谷本意。

1. 释用典与比兴的深意

如《次韵奉送公定》“燕赵游侠子，长安轻薄儿。狂掉三寸舌，躡登九级墀。覆手云雨翻，立谈光阴移。歃血盟父子，指天出肝脾。从来国器重，见谓骨相奇。筑岩发梦寐，猎渭非熊螭。百工改绳墨，一世擅文词。全人胆肩肩，瓮盎妩且宜。”史容注：

山谷诗意谓熙宁用人非贤而谓之贤，贤则指为不肖也。所谓“游侠子”、“轻薄儿”，盖言当时新进少年趋时苟合，以口舌捷给，躡等进用，虽歃血而盟，自谓披腹而出肝脾，其言皆不足信也。王介甫素有重名，称为“国器”，其遇主得时，如起于筑岩、钓渭，而改制定法，自眩文词，附已者超迁之，语不合意，辄摈斥不用，所谓悦闇跋、支离、瓮盎大癰，而全视之无疾者，乃诋为丑恶也。《前集》《神宗挽词》固云‘筑钓收贤辅。’此诗含讥讽，非一过可了，故详言之。^{[1]598}

除此诗外，黄诗多处讽刺熙宁年间滥用少年人物，也表达了对王安石熙宁新法的不满。这段诗句用了多个古代典故以影现实，若非史容既了解时事，亦明白黄庭坚的态度，反复揣摩，难明诗中深意。

又同诗“大槐阴黄庭，女萝绵络之。韶阳两兄弟，还自妬蛾眉。工颦又宜笑，百辈来茹咨。班姬轻鸿毛，更合众口吹。”史容注：

此事以喻王、吕初为党而后乖争，班姬以喻当时逐客也。按《实录》，熙宁七年三月王安石知江宁军府。八年正月秘阁校理王国安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初，王安石将罢，相引吕惠卿执政。惠卿素与安国有隙，因侠狱抵安国罪。是年二月安石复相，自后王、吕之交遂绝。山谷时在北京。^{[1]599}

这段诗句除用典故之外，还掺用了比兴手法，

更显含蓄隐晦。史容以时事证之，无胶柱鼓瑟、穿凿附会之嫌。

又如《过致政屯田刘公隐庐》“王阳已富贵，尘冠不肯弹。”史容注：

《汉书》：王吉字子阳，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道原与王介甫有旧，介甫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辞不就，因言“宜恢张尧舜之道，不应以财利为先”。介甫不能用，亦未之怒也。及吕诲得罪知邓州，道原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怒，遂与之绝。道原以亲老，遂告归南康，乞监酒税以就养。^{[1]761}

诗中黄庭坚灵活地使用“王阳在位，贡禹弹冠”之典，变其后半之意。史容能准确地捕捉黄庭坚的构思，从刘恕（道原）与王安石交情的前后变化窥测黄庭坚变用典故的艺术匠心，并准确地解释诗意图。

2. 释直接议论的诗句

如《同尧民游灵源庙廖献臣置酒用马陵二字赋诗》“排河着地中，势必千里下。移民就宽闲，何地不耕稼。此论似太高，吾亦茫取舍。有器可深川，吾未之学也。”史容注：

此语盖指时事。按《实录》且参以诸书，其

大要云：元丰元年知制诰熊本分司西京，判大名府文彦博放罪。初，选人李公义等为铁龙爪，内侍黄怀信以为未尽，更作浚川杷，谓禹所用浚川者也。时王安石为相，信其说，乃置浚川司，以都水监丞范子渊制之。既而子渊奏功未赏，乃言疏导水势，悉归故道，出民田数万顷。朝廷下大名府保奏，文彦博言小臣利诬罔，诏本行视，坐附会彦博，报不以实，故谪。^{[1]667}

此诗黄庭坚反对范子渊提出的决黄河归故道之议。黄庭坚认为黄河归故道虽可得良田数万顷，但获田之利通过移民垦荒的方法亦可实现，而决河之议还有重大的副作用，即千里之下皆成泽国。两相比较，功不抵过。由于诗歌贵在精炼含蓄，故黄庭坚在诗中不可能作更多的铺叙，只能凝炼地提出主要观点。史容广泛阅读了各类史料，探究出黄庭坚的用意，并在注中补充了大量细节材料以说明黄庭坚的意图，从而解释了诗意图。

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继承了宋人注宋诗中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方法，善于考证编年、解释时事的传统，继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之后忠实地解释了黄庭坚的诗意图，并将此传统延续给其孙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在宋代诗歌注释史与黄庭坚研究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黄庭坚. 山谷诗集注[M]. 任渊, 史容, 史季温,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 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A]//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40.
- [3]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54.
- [4] 史容. 山谷外集诗注引[A]//山谷外集诗注[M]. 《四部丛刊续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年(1934): 4-5.
- [5] 史季温. 闽宪刊山谷外集诗注跋[A]//山谷外集诗注[M]. 武英殿聚珍本: 卷首.
- [6] 傅璇琮.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374.
- [7]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329.
- [8] 黄蜀. 山谷年谱[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9] 汪辟疆. 汪辟疆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870.
- [10] 林希逸. 竹溪齋十一稿续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686.
- [11] 惠洪. 冷斋夜话[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80.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notations in Shi Rong's Shan Gu Wai JI Shi Zhu HE Zet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manitie institutes, Guang 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 Shi Rong's Shan Gu Wai JI Shi Zhu, he used the method named “demonstrating meanings of poems by history” to explain Huang Tinjian's poems, which continue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annotating Song poems by Song scholars”. Shi Rong chronologized poems by Huang Tinjian's career, and put Huang Tinjian's biographical chronology behind the poems. In this way, he also corrected the mistakes of chronicle in Huang Xun's Shan Gu Nian Pu. Furthermore, Shi Rong quoted various authentic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id reference checking for the political backdrop of these poem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ir meanings. He emphatically interpreted some poems related with contemporary history, especially those that applied figurative languages and allusions.

Key words: Shi Rong; Huang Tingjian's poems; poem annotation; chronology; demonstrating meanings of poems by history

[责任编辑:箫姚]